

考古中国

走近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梁岩华

3月28日,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从众多项目中脱颖而出,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邻瓯江,东靠海坛山,隔江与江心屿双塔遥相呼应。2021年10月,温州望江路下穿隧道施工过程中发现遗迹线索,工程立即停工。2022年,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发现了分别建于宋元和明清的朔门瓮城遗迹,实证千年以来岸线变迁的江堤、桥梁、陡门闸、棧道等建筑遗迹,还有8座宋代码头、2艘宋代沉船,以及数以吨计的宋元瓷片堆积和形式多样的漆木器等遗物,年代主要集中于宋元时期。800年前温州古港“城脚千家具舟楫,江心双塔压涛波”的繁华景象,重现于人们眼前。

“这是迄今为止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考古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突出价值,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支撑性遗产点。”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姜波如此评价。

过去,谈到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较多关注广州、泉州、宁波、南京等城市。温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着怎样的独特作用?朔门古港遗址的考古成果,从哪些方面凸显了温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地形得天独厚,城址、港址千年不易

创建于东晋太宁元年(323年)的温州古城已有1700年的历史,选址可谓得天独厚。城东西依山,北临瓯江,南濒会昌湖,因城址附近九山错落,状如北斗,号称斗城。瓯江下游南岸恰好有郭公山、海坛山两山东西相对,可以抵御江流与海潮的冲击,因此,两山之间的江段,港阔水深、岸线稳定。温州城便建于这段优良港湾之中。

得天独厚的地形优势,赋予温州坚固的城防和天然良港之利,加上城市规模宏大,自建城后,城址、港址1700年来基本未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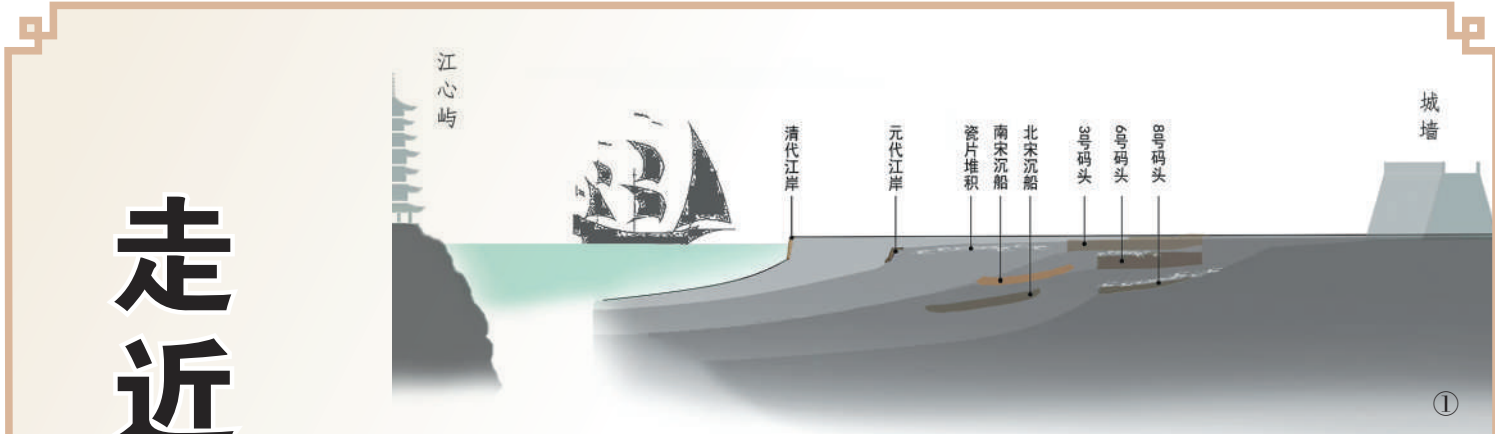
由于处在中国东部海岸线中间位置,并具备优良的港口条件,温州很早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2018年,永嘉瓯北丁山古墓群中的东晋墓出土了原产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的磨花玻璃碗,这是温州较早参与“海丝”贸易的重要物证。唐代晚期,温州成为日商停泊的主要港口之一。北宋晚期至元代,随着龙泉窑的崛起,温州港进入鼎盛时期。南宋至元,朝廷在温州分别设有市舶务和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

考古发掘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港口形制。发掘区西、东两端分别为朔门瓮城及水门外遗迹群,中间跨度达380米的条带状区域中,密集分布着码头、沉船、栏杆式建筑、堤岸等。其中,码头遗址多为多级台状的突堤式码头。两宋时期的突堤式码头多建于江边滩涂,平面呈长方形,石包土心结构,底部及周缘用木桩打底和围护,以抵御水流冲刷侵蚀,实现软基加固。这一先进技术,显示出古人的智慧。

温州具有推动海上贸易的物质支撑

温州地形“七山二水一分田”,导致“海育多于地产”。这里平原面积狭小,稻田不足,粮食不能自给,故渔盐等海洋产业和工商业占有重要地位,民间海上贸易十分活跃。唐代大历年间(766—779年),永嘉盐监即为全国十监之一,此后温州盐业一直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温州又是“百工之乡”,是著名的



核心阅读

朔门古港遗址包括码头、航船、航线、航标塔、城市、窑业等,是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遗迹中要素完备的港口遗址。它的发现,填补了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类遗产的空白,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增添了一个典型样本。



纺织业和漆器制作中心,宋代温州漆器曾有“天下第一”的美誉。

多山滨海的地理环境、外向型的经济结构,塑造了温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南宋以叶适为代表,形成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的永嘉学派,主张“义利并举”,通商惠工,在思想领域影响深远。

温州古称东瓯,这里的先民以善于用舟、航海著称,至迟在商周时期已实现与中原的

海路交往。三国东吴时期设置的横屿船屯,是当时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唐代温州成为全国主要造船基地之一,括州(丽水)的造船基地即设在永嘉县城北沿江一带。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全国官营造船场年造船额2900多艘,诏“温州、明州岁造船以600只为额”。温州、明州(宁波)造船额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技术国内领先。

拥有丰富林木资源的浙西南山区,是温

州船用木料的主要来源地。瓯江水道自古以来一直是木材运输的通道。直到今天,浙南规模最大的温州木材市场仍位于瓯江边上。此外,一些大木料多来自龙泉等地,故温州民间向有“龙泉料”之说。发达的造船业和辐射周边地区的木材市场,是温州港兴旺繁荣的物质基础,为区域内商品和温州商人走向世界提供了技术支撑。

此次考古过程中,古沉船的发现令人兴奋。虽然最先发现的第一艘沉船已经断成南北两段,残存的船头和部分船体变形严重,但根据隔舱板残存数量推测,该船全长约20米。另一艘沉船则发现于深达9米的西部隧道基坑底部。两艘沉船均为宋代的福船,具有龙骨结构、水密隔舱等当时最先进的创新技术,这说明当时温州同其他城市交往密切。沉船也进一步指明了宋代码头所在。

“天下龙泉”的海运起点和枢纽港

本次发掘揭露的密集分布的码头遗迹以及海量的瓷片堆积,印证了温州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节点以及龙泉窑贸易枢纽港的地位。遗址瓷片堆积多呈条带状集中分布,时代为元代,九成以上为龙泉窑,且绝大多数无使用痕迹,应为贸易瓷在储存、转运过程中的损耗品。此外,还出土了建窑系黑釉瓷、青白瓷及瓯窑褐彩绘青瓷等其他窑系遗物,部分瓷器外底有墨书。

龙泉窑的技术源头,主要出自越窑。北宋中期,浙东以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逐渐走向衰落。北宋晚期,浙西南以金村、大窑为核心的龙泉窑开始兴起。而地处二者中间地带的北宋中晚期黄岩沙埠窑,在烧造技艺上,以越窑为基础,吸纳北方定窑、耀州窑的长处,装饰纹样丰富,刻划技艺精湛,产品面貌向龙泉窑过渡。特别是该窑北宋中晚期生产的双面刻划花青瓷,成为稍后一段时期龙泉窑的主流产品。

龙泉位于瓯江上游,顺江而下到温州换船出海,是龙泉青瓷当时最为便捷的外运方式。北宋晚期,为扩大龙泉窑的外运,瓯江上游河滩还进行过大规模整治,使“凡昔所难,尽成安流,舟昼夜行,无复激射覆溺之虞”。瓯江顿时成为当时最繁忙的贸易航道之一,呈现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舶来往如织”的盛况。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通常分为生产、运输和市场三个环节,朔门古港遗址与这三个环节相关的要素非常齐全,包括码头、航船、航线、航标塔、城市、窑业等,是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遗迹中要素完备的港口遗址。它的发现,填补了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类遗产的空白,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增添了一个典型样本。

(作者为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图①:温州朔门古港岸线变迁示意图。

图②: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北宋晚期湖田窑青白釉瓷台盏。

图③:朔门古港遗址3号码头(局部)。

图④:朔门古港与江心屿航标塔俯拍。

以上图片均为梁岩华提供

版式设计:蔡华伟



剑川古城一角。

苏金泉摄

今年3月5日,经国务院批复,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的剑川县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第三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另外两处为大理古城和巍山古城。

剑川县与丽江、怒江和香格里拉接壤,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是汉藏文化的交汇点,更是历史上滇西北地区金沙江文化与澜沧江文化的分界点,历史文化遗存丰富,白族文化特征鲜明。

5300多年前,剑川已有先民活动,境内历史文化遗存众多。有被誉为“南天瑰宝”、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宝山石窟,有“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沙溪寺登街,有证实剑川为云南青铜文明开端、稻麦复种农耕之源的海门口遗址,更有风貌古朴、格局完整的剑川古城。

史料有明确记载的剑川最早筑城是唐代的罗鲁城,位于现在的甸南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这里初为唐朝治所,为防御南诏的要冲,后为南诏国所并。罗鲁城失去了要冲作用,人们又在现在的剑川县城南三里处新筑望德城,到明初废弃。明洪武二十二年,当地人再次重新选址建县城,经百余年终于竣工,从此城址不变,一直是剑川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

古城的四门和城墙在岁月变迁中已然无存,但所幸整个古城格局基本没有变化,内部功能分区明确,街巷尤其规整有序。四门街道结合处都以“丁字形”连接,街直而不宽,宽度一丈左右;巷长而不直,宽度不超四尺,随弯就曲,不可行车,来往步行。从南门外到北门外的街为主要商贸通道,两旁民居均为前铺后院的建筑,买卖居住两相宜。从文照街向西至文庙,街道两侧和正中均以青石板铺设,中间以弹石镶嵌。旧时,官员走正中青石路,有功名和德高望重者走两侧青石路,平民走弹石路。

古城内有大量民居留存,建筑样式均为白族的“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这种民族民居样式,吸收了北方庭院式和南方楼台式建筑风格。“三坊一照壁”与北方四合院相近,由一正房、两厢房和一照壁组成,通常正房坐西朝东,正对照壁。在院子四角再建耳房连接,形成四个小天井和两天井相连的“四合五天井”样式。白族民居合院式空间布局在明代就已成型。院落大门位置必须位于正房左侧,门楼可以雕梁画栋、飞檐垂角。民居灰瓦白墙,木构架均为榫卯结构,颇有神韵。

20多年前,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来剑川检查指导工作,专家们不约而同地对散步经过的西门街赞叹不已,认为西门街传统街巷保留完整,成片的明清白族传统民居建筑格局和样式完好,有重大的保护价值。2006年,剑川西门街古建筑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此为契机,剑川县的文物保护工作有了质的提升,从原来的点状保护转为涵盖文化遗产留存生态、格局、风貌和地域特点的全域整体性保护。集中反映古城风貌特色的西门街、张家冲、营盘巷等22公顷传统街巷区域被划定为保护区,区域内主要空间尺度保持不变,不得新建任何建筑。此区域外的25公顷古城范围为建设控制地带,这一区域内若有不得不进行的建设活动,在建筑空间风貌、体量样式、建材工艺等方面也必须“修旧如旧”。古城外围50至150米范围内的42公顷区域为环境协调区,这一区域的改变需遵循一个原则:不能对古城视觉完整性造成破坏。

古城保护规划的重点是民居保护。以名人故居为载体,规划民族文化博物馆群。目前,已有剑川历史文化博物馆、剑川民族博物馆、周钟岳纪念馆、国家方志馆南方丝绸之路分馆等。

2014年,国家文物局评审通过了剑川西门街古建筑群修缮方案,对重点院落逐项修缮,整合棚户区改造经费和城建资金,对各类民居进行文物专业修缮。正是这次修缮使古城得以延年益寿。目前,剑川古城内90%以上的建筑都是古民居,其中明代建筑21处,清代建筑146处。年代最早的是建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的赵将军第,为明初戍卫剑川的赵姓将领的宅院。

古城民居都一直有人居住,只有一处例外,那就是昭忠祠。整个建筑格局完整,为三进院,由祠堂、过厅、门楼及厢房组成,是云南明代建筑遗存中的典型。现在,这里成了公益性文化艺术展示场所,精巧的建筑和精美的艺术作品相映生辉、相得益彰。

人居环境的改善、文化底蕴的彰显,提升了居民的自尊自信。漫步剑川古城,你会注意到,家家户户大门上贴的不是门神,而是请当地文人画的花鸟、写的诗词。县城98%的居民都是白族人,白族文化也在客栈、餐饮以及木雕、石雕、布扎、刺绣、黑陶等手工制作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能工巧匠大显身手,剑川白族人家在门口致富的理想一点点变成现实。

古城剑川气自华

王峥嵘

“铁与火”铸就的艺术之花

吴安亚

至南陵,夜晚看见众多汉子冶铜炼铁的壮观场面,留下诗作《秋浦歌》:“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另外,芜湖还有铁石墩、打铜巷、铁山等特色鲜明的地名。

芜湖人自古就和“铁与火”结下了不解之缘,锻制铁画也就成了偶然中的必然。

据考证,芜湖铁画是由明末清初的铁工汤鹏和画家萧云从共同创造。汤鹏现有《梅兰竹菊》《溪山烟霞》等铁画作品存世,珍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铁字楹联“晴窗流竹露,夜雨长兰芽”,创作于1687年,是目前发现较早的汤鹏作品。萧云从晚年结识汤鹏,成忘年交,常赐画稿并指导汤鹏以铁作画。约百年后,清代官员黄钺回乡省亲,发现祖屋中的汤鹏铁画,将其带入朝廷,受到乾隆皇帝喜爱,铁画逐渐成名,众铁工竞相

仿制,盛极一时。

1881年,铁工沈国华开了一间“沈义兴自制铁铺”,之后,沈国华将技术传授给了儿子沈德金。芜湖铁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储金霞的父亲储炎庆,就是在“沈义兴自制铁铺”帮工期间,第一次看到“梅兰竹菊”四件套铁画,从此爱上铁画,通过“偷师学艺”,掌握了这门绝技。

新中国成立后,芜湖铁画迎来了春天。1956年,芜湖工艺美术厂成立,安徽师范大学派出两位优秀画家入驻该厂,与大家共同研究了两年多。储炎庆和弟子开始了芜湖铁画锻制技术的发掘与创新,他们的代表作品《松鹰图》《花蝶》等参加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并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他们的铁画作品《迎客松》落地大座屏,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而作,

制成后饱受赞誉,被放在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贵宾接待厅的显眼位置。

改革开放后,芜湖铁画蓬勃发展,从业者达上百人,众多艺术家光临并赐画稿,诞生了许多经典作品。比如1990年为北京亚运会制作的上万件瓷盘铁画《熊猫盼盼》,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制作的铁画《霞蔚千秋》等。

今天的芜湖铁画,在传统的尺幅小景、画灯、屏风基础上,又创新发展出立体铁画、盆景铁画、瓷板铁画和镀金铁画等,形成了多个系列品种。很多铁画已经从墙上“走下来”,成为现代人生活中的艺术品及伴手礼。

以锤为笔,以铁为墨,以砧为纸,以炉为砚,既具有国画的神韵,又具雕塑的立体美,芜湖铁画以其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和魅力,立于中国艺苑之林。

传承之光

芜湖濒临长江,自古以来冶铁业就十分发达,故有“铁到芜湖自成钢”的美誉。这为芜湖铁画的诞生提供了基础。经过35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铁画已成为芜湖的一张名片。2006年,“芜湖铁画锻制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芜湖市南陵县大工山古铜矿冶炼遗址,是我国最早的古铜矿冶炼遗址之一。从西周至南宋,炼铜的熊熊火光延续两千余年,所产“丹阳铜”享誉九州。唐代诗人李白游